

试论湖北新军向革命的转化

李天松 陈桢璉

湖北新军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一八九六年建立起来的一支近代化的反革命武装。一九〇七年这支武装(即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一百零四人。^①

湖北新军建立后,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清政府对待湖北新军也如同对待北洋新军一样极为重视。从一九〇二年起,湖北新军已成为训练和培养全国各省新军将弁的最重要中心之一,所以当时“各省练兵无不奉北洋、湖北为圭臬,各军将弁无不出于两系。”^②同时,这支武装建立后,不仅对湖北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了残暴的镇压,而且对一九〇三年开始的广西农民起义,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人民起义,一九〇八年的安庆炮营起义,一九一〇年的长沙抢米风潮都直接参与了镇压,对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起过很大的作用。但这样一支反革命武装为什么在辛亥革命时期,逐渐转向了革命,成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呢?显然存在一个由反革命武装转变为革命武装的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探讨这一过程,不仅对理解湖北新军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而且对理解整个清末新军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湖北新军在辛亥革命时期能转向革命,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形势的发展对新军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相勾结,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不仅取得了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特权,而且获得了投资的特权。它们霸占中国的海关,向中国大量推销剩余产品和鸦片,又利用特权,掠夺中国的农村产品。中国的入超,每年达一亿三千二百万元。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对华投资迅速增长。一九〇二年投资总额八亿美元,一九一四年就增至十六亿多美元。它们在中国拥有工厂、矿山、铁路、轮船、电报、银行、洋行、学校、医院等等。同时,还控制了

中国六千哩的铁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航运,绝大部分产煤和全部生铁。帝国主义还强迫清政府开放了八十三处商埠,十六处租界,九处租借地,并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准备最后瓜分中国。它们的军队可以在铁路沿线任意驻扎。它们的军舰可以在各通商口岸横冲直撞。它们的公使、顾问、海关税务司可以直接操纵中国的政治。当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它们血腥镇压下去之后,其侵略更加深入而广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它们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合同等共达五百余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内政外交、工矿企业、财政金融、交通贸易、文化教育,乃至军事国防等各个方面,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达到了“谓之不亡不可,谓之亡亦不可”的严重程度。

在这种危急的局势面前,腐朽的清政府不但不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相反,却死心塌地

的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无耻地执行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投降卖国政策，把国家的主权，人民的财富，拱手献给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同时，它为了支付巨额的赔款和浩大的军费开支，在经济上也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的搜刮。清政府的岁入，从一九〇三年的一亿两，到一九一一年就激增至三亿两。

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野蛮掠夺下，日益贫困破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因而只好起来进行反抗。正如孙中山所说：“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③由于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和忠实的代理人，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必须推翻罪恶的清政府。因为“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湖北人民在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说：“湖北人当富有票起事，虽未群起相助，而对甲午、庚子迭遭外侮，有识者固已深感于开通民智以救国，虽匹夫亦有责焉！夫御外侮，必倾覆清廷，以谋民族解放，此为革命最初必经之步骤。”^④所以在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斗争仍然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人民的斗争，一九〇五年共计九十余次，一九〇六年增至一百六十余次，一九一〇年高达二百八十五次。清政府为了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下，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凶恶本性，促使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湖北新军士兵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也明确认识到“欲汉族子孙不受制于清廷，中华民族不沦于外国，只有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⑤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在领导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又发动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又遭失败，但革命党人在战斗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正如孙中山所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未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⑥湖北新军士兵听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后，“莫不愤慨万分，个个磨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都希望早日发难。”^⑦在湖北新军中奋斗了近十年的革命党人，因此加强了对起义的准备。共进会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首先发动起义。”^⑧文学社“尤勇气倍增”，这样使湖北的“革命空气由震荡而日渐高涨。”^⑨

一九一一年五月，当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南下强行接收四省铁路公司后，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清怒潮，成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武汉人民也纷纷集会抗议，刊布传单，四出讲演，到会的新军士兵和商民，有的当场断指写血书：“路亡流血，流血争路，路存国存，存路救国。”^⑩接着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很快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清政府命令端方带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端方的领兵入川，更加激怒了广大新军士兵对清朝统治者的忿恨，促使湖北新军士兵迅速而普遍地转向了革命。

二 湖北新军转向革命的社会基础

湖北新军士兵的基本来源是贫困破产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人的入伍是与当时湖

北新军招募条件相矛盾的。招募条件规定：“选取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或数有恒产，或向有职业，手艺自足资生，并非持勇粮为生计者，……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始准收录。”^⑩但这一规定当时无法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一九〇四年张之洞曾想征兵“渐次更换合格”，但结果“身家不卑，素有职业，资质聪颖，能自写字者，多不愿入营充兵。”^⑪“而其终也，投军之壮丁，无财产，无教育，皆穷乏无告之民”^⑫。这说明士兵的主要成分是清统治者不想要而又不得不要的贫苦大众，是确实无疑的。《六十年的变迁》一书的作者李六如讲到知识分子季文恕（即李本人）的队上“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农民和一部分城市失业工人，”^⑬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些人既然不是新军招募的对象，为什么要投入新军？清统治者又何故接收他们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所处的经济地位来加以考察。

湖北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最深重的地区之一。帝国主义的魔爪从一八六二年汉口辟为商埠后就深入了湖北。十九世纪末，则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随后日、德、俄、法、美等国也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掠夺，逐渐掌握了湖北的金融、工矿、商业、交通等命脉，仅在武汉的外国各种企业即达一百八十多家。一九〇二年后，汉口对外贸易激增，是年汉口进出口货物共值一亿零三十二万一千两，一九一〇年增至一亿五千二百十九万九千两。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给湖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也极为严重。农村土地完全为地主官僚所掌握。象谷城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就有三四十家，襄阳黄、单、杨、刘等家大地主都拥有田地数千亩，土地达到了高度集中的程度。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十分苛重，有的甚至重到“三七分”、“二八分”。地租剥削已榨尽了农民的血汗，高利贷者又进一步加紧盘剥，迫使农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再加上清政府任意摊派赔款、军费及“新政”费用等等，然后便以各种名目的捐税，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压得他们更加喘不过气来。农民除交纳“漕粮地丁耗羨”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任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而潜逃者比比也。”^⑭这样更加速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批流入城市，如汉口一地就聚至二十万人。^⑮一部分补充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外，而大部分仍求生无路，正好这个时期，湖北新军大量招募士兵，一部分流离失所的农民，投入了新军。

清政府所定招募新军士兵的条件，是要“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的，但那时广大人民长期遭受帝、封建的残酷压迫剥削，生活都无法保障，还那有能力去上学读书哩！何况历来的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和奴役人民，一贯采取愚民政策，除地主官僚的子弟能上学读书外，一般农民子弟是很少上学读书的。地主官僚的子弟，不会入伍当兵，而少数农民读书子弟即使全部投入新军，也不能解决新军的兵源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清政府要扩大新军，就不得不降低条件，接收那些贫困破产的劳动大众了。

湖北新军士兵的主要成分虽然是贫苦的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但在一九〇三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后，知识分子投军逐渐增多，成为新军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而且湖北新军士兵中的知识分子比他省为多，也是应该肯定的。湖北新军士兵为什么普遍转向革命，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投军，是因科举废除后，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出国留学或投入新式学校；一条是投入新军。前者只有地主官僚或其他家庭环境较好的知识

分子才能走，而对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是望尘莫及的。本来农家读书子弟随着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的处境就很惨，再加上科举的废除，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无出路，而且在政治上也阻塞了他们“求仕进”的前途。这时“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①企图“寻找出路”，因此出现了“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的情景。如一九〇五年一次在黄陂招募的九十六名士兵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②据有人统计“三十二标中，知识分子占有百分之二三十。”^③

总之，无论是农民，城市失业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参加新军而“寻找出路”的，但他们入伍后，与自己的愿望完全相反，不仅在经济上未找到出路，而且在政治上仍遭受着严重的压迫。

就经济上来说，由于新军统治机构的腐败，贪污舞弊在新军中极为严重。镇统张彪“吞蚀军款百万有奇”，协统、标统全是“花天酒地，广置姬妾”，大肆克扣军饷。^④士兵不堪虐待，“逃亡甚多”，而每当逃亡士兵追捕回营后，则任意罚款或克扣军饷，造成士兵生活上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对那些有沉重家庭负担的士兵，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倘所罚薪饷并其他处分过事从严，殊于军人生计，不无妨碍。”^⑤

新军士兵薪饷本极低微，加上层层克扣，所剩无几，因此有人入伍后，只好忍着疼痛，弃家不管。《六十谈往》一书的作者胡祖舜叙述其个人经历时说：“当余之从军也，家庭原无所闻。在一年中，吾母吾妻，因失所赡养，间为人佣农作以自给，吾弟亦为艺徒，余虽不知其详，而家境困乏至极，即不难想象及之，然亦束手无善策，徒自饮憾耳。一日，先叔父……来营……语余曰：……何为久不以告？使家中老幼悬念不释，何其忍也？余曰：……兵士锱铢饷银（月仅三两九钱，内扣伙食费），不足赡养家室，一纸空书，不惟不足以慰仰望，恐将增其怨恨，是以不告。”^⑥由于他在经济上不能照顾家庭，其母“未及年许，遽尔辞世。”^⑦这种凄惨情景在新军士兵中何止胡祖舜一人！

就政治上来说，他们也没有找到任何出路，由于清政府一贯执行狭隘的民族主义歧视政策，满汉矛盾本极尖锐，而他们入伍后更感到满汉矛盾的严重。“陆军受满籍者，双粮双饷，大官好缺，均受满人。”^⑧湖北军政完全为满人掌握，瑞澂任湖广总督、铁忠任督练公所总办，连甲掌握湖北财政，他们在鄂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深为汉族士兵所痛恨。尤其是新军士兵中的知识分子，一般都读过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的遗著，多明“夷夏之义”，“富有种族思想”，这种思想与接触到的现实结合起来，必然产生对清政府的憎恨。

知识分子开始是想通过入伍的途径出国留学或考入本省陆军学堂的。的确，张之洞督鄂时曾派了一批人出国留学，也开办了陆军小学堂，吸收士兵中的知识分子入堂学习，毕业后充下级军官之用。因此，他们对此希望很大。但后来不仅未派他们出国留学，就是陆军小学仁、信两斋毕业的学兵一千五六百人，真正提升为下级军官的不及一百人。^⑨不仅如此，那些未提升的学兵，处境更为悲惨，“既为在职军官所歧视，兵目又往往加以非难，以致抑郁难堪。”^⑩造成了他们与清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军中的官兵矛盾又进一步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军官对于士兵可任意罚跪、杖责、开除。如二十九标士兵高震中因与士兵颇接近，满人排长认为他有革命嫌疑，报告管带到该排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但仍宣称：“高某行为不检，违反营规，着从轻处罚，禁闭一星期开除。”^⑪又如炮八标二营右队士兵蔡文玉，因提升未经队官蔡永胜先知，即认为他是越级邀赏，乃借故棍责该兵二千余下，继用铁丝组成铁鞭，遍抽背腹，当场毙命。^⑫这种对待士兵的横蛮无理的态度，也必然激起广大士兵对清政府的痛恨。

三 湖北革命党人对新军的运动

湖北革命党人运动新军开展较早，而且他们在开始运动之前，首先认真地总结了唐才常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这次起义失败是“当时军学各界，多未接受革命思潮，惟煽动会党为发动主力。时至近代，政府武力虽不足恃，但凭无饷无械无训练乌合之众扑之，未有能制胜者也。”^②因此在他们“谈及革命进行方略”时，即认为“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必须“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来“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③对学生痛下功夫，他们没有困难。而新军是清政府的反动武装，要把它变成革命武装，这是一件非常细致而艰巨的工作。因此，一九〇四年湖北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时，就明确制定了“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④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制定后，湖北革命党人陆续投入了新军。“胡瑛、张难先投工程营为兵，……刘静庵则早已在马队营入伍矣。”^⑤为了使运动新军的工作顺利开展，“刘敬安于武昌组织一救世军，秘约军中同志分途运动，……倘张之洞有招兵事，……即用秘电招会党来入伍，科学补习所专作介绍入伍机关。”^⑥该所介绍入伍的，并非只是会党，介绍知识分子入伍，也是他们的重要任务，如“吴禄贞介绍入营者，前后三十余人，且大半为秀才。”^⑦因此有人总结该所的功绩时，说它提倡知识分子投军，为运动新军打下了基础。^⑧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一九〇六年以刘静庵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日知会正式成立后，由于直接受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影响，对推动湖北的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年七月，孙中山任余诚为湖北同盟分会会长，余回湖北后，即将他组织的日知会会员，吸收加入同盟会，仍推他为总干事。^⑧这样日知会实际上就成了湖北同盟分会，并按照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来指导革命活动。“湖北党务，得余刘和衷共济，……其进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⑨这时他们开展的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进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⑧这时他们开展的情况有以下几点：

第一，采用大规模的集会讲演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每星期日都进行集会演讲，其内容“多根据孟子与王船山、黄宗羲诸家之说，阐发民族、民权思想，而亡国之痛实为人类最痛心之境，每每发挥无遗。”^⑨“对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亡之道”也阐明很深刻，而且他们在讲演时，“声情激昂”，甚至“痛哭流涕”，以此激发听众的革命情绪，因而听众“咸为感悚”，“多醉心革命，执守不惑矣。”^⑩特别是一九〇六年六月，孙中山派法国武官欧吉罗来汉进行演讲后，对军界影响更大。“时陆军学生，皆饱吸新空气，多加入同盟会。”“新军中的初级官佐，此时亦为潮流所激荡，咸思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家求生存。”^⑪

第二，利用各种革命书报，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革命党人开始是把东京出版的《民报》及其他革命书册，由同盟会员设法输入湖北，后逐渐传入军队。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又在黄州设立秘密印刷所，一方面大量翻印《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诸书，另一方面又亲自编写《孔孟心肝》、《破雷梦》、《俄占辽东》等革命小册子，送给士兵阅览。“各兵士每读到《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则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④因为他们阅读这些充满爱国激情书报后，知道“中国瓜分之祸迫于眉睫，人民生活悲惨万分，无一不是清朝统治的恶果。”^⑤促使士兵的革命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

第三，积极进行组织发展活动。日知会时期的组织活动，是“专以发展军官为主”。^⑬日知会一百多会员中新军参加者，多为督队官，队官。这是由于他们只看到“军官在军队中从事革命活动较士兵为方便，容易掩护革命进行”^⑭的表面现象而作出的决定方针。由于此方针忽

视了在士兵中进行组织发展活动，故日知会对新军的组织发展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尽管他们在新军中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但在士兵中未扎下稳固的革命根基，加之他们的宣传活动多采取公开集会演讲方式，不能隐蔽革命力量，因此当清政府一查禁，几个主要干部被捕，致使湖北的民主革命运动遭到了极大的挫折。这一惨痛的教训，使党人对新军的运动转入了运动士兵的时期。一九〇八年群治学社明确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④这就是党人转变的标志。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转变呢？这是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

正如前面所述，这个时期不仅广大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汹涌澎湃，而且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也在两广、云南等地屡仆屡起，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所以孙中山指出：“满清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⑤这种形势对于自日知会失败后，正在彷徨中的湖北革命党人给予了巨大的鼓舞，使他们积极地开展了革命活动。而清政府则更加恐慌，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在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情况下，不仅原来未参加日知会的反动军官，这时变得更加反动，就是曾经参加日知会的少数军官，这时也“销声匿迹”，甚至自首，背叛了革命。这就使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专以发展军官为主”有很多致命弱点，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⑥甚至“官性、奴性夹杂其间，革命性薄弱，兼含有危险性。”^⑦从此他们与军官就基本上断绝了关系。而随着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士兵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湖北新军士兵中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湖北军队同盟会的出现，正是人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在士兵中引起的反映。它的产生对湖北的民主革命影响“至重且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军队愈来愈多的开始反映出人民的情绪和思想，它作为压迫的工具，就愈来愈不可靠了。……如果曙光一旦在军队中照耀起来，那就是说，旧世界的末日就不出几年了。”^⑧新军士兵在日知会失败后所表现的革命积极性，就不能不给党人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数众多的士兵群众才是一支真正可靠的革命力量。因此，他们便制定了“期从兵士入手，另筑基础”^⑨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制定，为运动新军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运动新军士兵比过去运动军官更为艰险。一方面是清政府对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进一步加强了对士兵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是新军中的反动军官对党人的活动与闻较多，更是党人运动士兵的障碍。在这种险恶情况下，为了使运动士兵的活动免蹈日知会的覆辙，他们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来推动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

首先，重视开展个别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提高士兵的民主革命思想觉悟。群治学社至文学社宣传革命时，均从“旗籍官兵均系双粮双饷，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汉人之上”等切身感受讲起，然后引伸到“种族革命”、“兴复汉族”，“救国救民”以及“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等，^⑩循序渐进的向士兵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共进会还在黄土坡等处分设酒店饭馆招待士兵。兵士前来吃饭，“即与之谈论营中痛苦，渐及于满汉不平等之事，灌输既久，兵士多有慷慨流涕，愿杀满人者。”^⑪他们的这种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宣传教育，对士兵教育很大，使他们逐渐地转向了革命。

其次，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把秘密的革命宣传和公开的革命鼓动巧妙的结合起来。群治学社有《商务报》，文学社有《大江报》，均以士兵利益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⑫如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麟克扣军饷，为《大江报》揭露抨击，而被革职查办。^⑬因此，“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

坚。”^{⑤⑥}同时，还鼓励士兵投稿，“凡军队中之社员，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借以训练社兵之胆识，而取得其同情，兼以坚其志。”^{⑤⑦}又赠送免费报纸供各营士兵阅览，以加强士兵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特别是当保路风潮高涨时，它又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煽动性的文章，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士兵的革命情绪，把湖北的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

第三，慎重地开展组织活动，不断壮大革命队伍。从群治学社开始，他们就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在社长之下，分设文书、会计、庶务、评议等部，职员采取选任或推任的办法产生。随着社员人数的增多，到振武学社时，又添设了各标、营、队代表，把革命组织与新军编制相结合，这可说是湖北党人的一个独特创造。文学社时又在队一级增设了基层单位——组，（共进会称支队），由于士兵中的革命组织严密，所以在清统治者对士兵的严格监视下，也能措置裕如地开展革命活动。

新军中的革命组织之所以严密，又是与党人在发展社员，采取极为谨慎的方针以及社内严格的组织纪律分不开的。

发展社员方面，群治学社明确规定：“凡入社之同志，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介绍，经本社派员考察，确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愿守本社一切规章者，方得为本社社员。”^{⑤⑧}这个规定振武学社、文学社都是严格遵循的。“文学社在发展社员时，除了给被发展者看本社简章外，还要给其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所宣传之主义。”^{⑤⑨}共进会是利用“联络邦会的方式，先换贴拜把，逐渐灌输革命思想，直到填写愿书入会为止。”^{⑤⑩}并且还利用酒店帐簿秘密登记新社员名字。正因为入会手续严格，就防止了坏人混入，保持了组织的纯洁性。

革命组织内部的纪律更为严格，凡士兵加入组织后，必须保守内部的秘密，对于家族、父、母、妻、子“不得泄露一言。”振武学社时还规定“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惟承代表之命，分途进行。”^{⑤⑪}因此各营队的活动是进行得非常隐蔽的，甚至“有不同营之社员相见，彼此不知同为社员。”^{⑤⑫}文学社又规定每星期各代表必须报告本标营队的现状，^{⑤⑬}以做到上下协调，行动一致，更增强了组织的战斗性。

由于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地在士兵中艰苦卓绝的工作，至武昌起义前，士兵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五千余人，占了湖北新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大批士兵是同情革命的，“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⑤⑭}这正如张难先所说：“革命党人意志冷静沉默，匪儒冠而讳新民，犹之西药以糖衣封其猛剂，食者甘之，而官厅遂毫不注意，士兵亦以彼辈可亲等于手足，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⑤⑮}即清政府的反动武装——湖北新军，在党人的运动之下，终于变成了一支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武昌起义中必然成为一支冲锋陷阵的革命力量。

湖北新军转向革命，从上所述，虽有三方面的原因，但革命形势的发展只是促进了士兵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湖北新军的社会基础只是说明士兵有转向革命的可能性，这两者都不是新军转向革命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这两者，全国各省新军都是同具的，为什么其他各省新军，有的没有转向革命，有的转向革命不及湖北新军普遍呢？关键在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湖北新军之所以普遍转向革命，是由于湖北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理论指导下，长期对士兵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和组织的结果。

湖北革命党人开始革命活动时，对革命武装问题就很重视。这是他们从近代人民革命，

特别是从唐才常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明确地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统治,没有革命的武装是不可能的。但由于他们本身力量的软弱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依靠人民大众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而走上了运动新军的道路。运动新军即将清政府的反动武装争取过来,变成革命的武装,然后以此力量去推翻清政府,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符合革命斗争需要的。可惜,他们只是单纯的停留在运动新军上面,而没有去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革命仍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虽然,他们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成功的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但起义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很快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篡夺,湖北的辛亥革命运动仍遭失败。

-
- ① 《清史稿》,兵志三,第11页。
 ②②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十九,四,第9756、9541页。
 ③⑥④⑥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175、181、62页。
 ④②③②⑥⑥① 《辛亥武昌首义纪》,卷上,第1,1,4,12,12页。
 ⑤⑦⑩②④⑤④⑤⑤⑤⑤⑤⑤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5、49、68、64、110、50、119、51、51、3、121页。
 ⑦⑩③⑤④④④⑦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90、95、110、112、112、112页。
 ⑧ 《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36页。
 ⑨④⑤⑤⑤⑥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55、36、36、55、56页。
 ⑩ 《鄂州血史》第52页。
 ⑪⑫ 《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二、六十五,奏议六十二、六十五。
 ⑬ 《外交报》,丙午,第三十号。
 ⑭⑤⑥ 《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第147—148、157页。
 ⑮ 《宣统政纪》卷十一,第24页。
 ⑯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23页。
 ⑰ 《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62页。
 ⑱⑲ 《六十谈往》第6页。
 ⑳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506页。
 ㉑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112页。
 ㉒ 《民立报》1910年10月25日。
 ㉓③①③⑦③④⑤⑤⑤④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107、55、121、81、147、149、234页。
 ㉔ 《武昌革命真史》卷首,自序。
 ㉕② 《建国月刊》,1930年二、三月第二卷,第四、五期。
 ㉖ 《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16页。
 ㉗④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578、577页。
 ㉘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281—282页。
 ㉙ 《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一分册,第4页。
 ㉚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635页。